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導 言

### 1-1-1 研究動機

活動於中國西北邊境的古代胡人，一直是筆者長期以來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以往雖對胡人問題投入甚多的關注，也以胡族之一的「月氏」完成碩士學位論文<sup>1</sup>，但對於「胡人」此一概念本身的起源、流變，卻缺乏進一步的探討。這個題目的研究動機來自於台灣社會近年來突然出現的一種新的「他者」(異己)

外勞。外勞的大量進入台灣，讓一般人覺得不但隨時都可遇見異族，而且外勞已經成為台灣社會常態的一部份，這是十幾年前所難以想像的。雖然台灣的部分原住民與外勞在外貌上區別不大，但起碼可用國語溝通，其實原住民早已是台灣社會的一種「他者」，不過真正給台灣民眾帶來強烈「異類感」的，恐怕還是要屬這些來自東南亞的外勞。他們與先前來到台灣的「老外」不同，其一是「老外」主要以白人為主，他們雖然在外貌與語言上與國人有明顯之差異，但國人不至於會對白人持鄙夷之態度；其二是早期「老外」來台的目的不外是學習中文、傳教、經商與旅遊，較少從事下階層的工作，雖然也會有非白人(如黑人)的老外出現，但他們大部分是美國人，或是來自非洲的友邦國家，來台目的並非以從事勞力工作為主。但外勞的角色便與老外有明顯不同，一來他們是來自於東南亞，而這些國家被國人認為是「落後」國家，而且來台從事的是下階層的勞力工作；二來他們不是白人，特別早期外勞的主要來源是菲律賓、印尼等國，他們在血統上是屬於南島民族，外型與台灣原住民接近，而原住民正是台灣社會早期的他者典型。隨著台灣本土化的浪潮推動，原住民的他者形象正逐漸弱化，外勞在此時的大量輸入，讓原住民的他者形象在此得到一個轉移的契機，台灣社會的他者形象迅速的轉移到「外勞」的身上，外勞取代了台灣原住民原先的他者角色(勞力工作者、弱勢者的選偶對象、以及心中對南島民族外型上的成見，讓漢人產生優越性的快感)。

---

<sup>1</sup> 拙作：《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由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在古代北疆史，自然聯想到古代北疆異族的代表「胡人」，是否也在古代中國社會扮演過類似的角色。胡人是繼戎狄之後中國最重要的北疆民族概念，在近代「洋人」、「洋鬼子」等歐洲西夷概念形成之前，胡人應是中國遠方異族典型的代表。對這樣一個長期影響中國異己（他者）觀的異族意象，有關其形成及早期之流變實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故此本文乃決定以早期「胡人」意象之形成與變遷作為研究對象。

### 1-1-2 論 旨

本文主要探討早期中國（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形成的過程，探討的方法有三：一是透過語源、語意的研究，釐清胡字早期的指涉對象及其文化概念。二是透過圖像的觀察，研究華夏 - 漢民族如何在圖像藝術上表現他們對夷狄、胡人的具體形象。三是透過早期文獻對夷狄、胡人的描述，分析華夏 - 漢民族對北疆民族「異類感」的內涵，並希望能透過對胡人身體意象的研究，進一步分析形成胡、漢之別之各種判別標準。

胡人一詞在先秦文獻的出現始自戰國時期，但任何一種新概念的形，都必須追溯其背後形成的歷史背景因素，因此在胡人觀念出現之前的「戎狄」或「夷狄」的概念，也在本文的討論之列。胡人概念的成形不可避免的會有先前戎狄觀念的影響，但即使如此，後來的胡人與先秦時期的戎狄還是有其歷史流變可供探索，本文的目標之一，即是在追溯此種從戎狄到胡人的轉變過程。而一種觀念既經成型後，隨著歷史時空的演進，必然也會經歷一種逐漸變遷的過程。胡人觀念在戰國形成後，其最初指涉的對象，是代北及其鄰近地區的游牧民族。到了西漢，胡人主要指的是匈奴，但自東漢以後，在胡人的內涵中，西域人的比重有逐漸增加的現象。這是一個異族概念逐漸發生定義對象轉移的過程。猶如今日台灣人心中的外勞觀念，由一開始的菲律賓女傭逐漸轉換成印尼外勞，再到泰勞，一直演變到最近的越南外勞一樣，人群心目中的他者形象，是有其歷史變遷可尋的。

本文擬從三個大方向來探索漢代對胡人的意象問題：

(一) 從語源上看，「胡」字作為一個異己（他者）之稱號，其指涉與內涵為何？

(二) 從圖像資料來觀察，從戎狄到胡人，華夏 - 漢民族是如何來型塑他們心目中的北疆異己形象。本文認為，漢人對於「胡」的認知，可能含有種族辨識意識在內。在漢人的心目中，一個典型的「胡」人應具某種刻板的形象（類似於看到「山姆大叔」的形象時，我們會馬上意會到畫面暗指的是美國人）。

(三) 從種族形貌的觀點來看，「胡人」是否有特殊的種族形象，胡人的外貌與漢人是否存在著差異？

(四) 漢人對夷狄與胡人的種族觀為何？「異類感」是來自於哪些被特別強調的面向？

本文的思考理路如下：一、先探索「胡」字的本意為何，是否一開始便有特定的指涉？「胡」的概念是在何時？何地最先形成的？胡與匈奴有何關聯？二、從戎狄到胡人的外在形象有哪些變遷的過程？一個典型的胡人在外形上有何特徵？三、胡人外在的種族差異因素，是否是區隔胡漢邊界的一種判別標準？四、先秦至兩漢對「夷狄」與「胡」的種族觀有何歷史變遷？那些是用來設定來區分夷夏、胡漢的種族邊界。

### 1-1-3 材 料

探討一個異己的心靈圖像，在概念上是屬於比較抽象的層次。一般人心靈圖像之組成可由兩方面來構成：一是透過文字描述或口耳相傳之後，在人心目中所形成的一種異族印象。這種意象的形成不一定要經過與異族的實際接觸才能產生，透過一些特別形塑後的文字描述或是口耳傳播，人們就可先入為主的對異族產生某種程度的民族偏見。另一種心靈圖像形成的途徑是透過與異族接觸時所產生的「異類感」，此種異類感的形成，通常來自異族與我族在種族外貌、語言、服飾、風俗的明顯區別。這種異族接觸的經驗一開始可能只是極少數人的特殊經歷，但人們會將其不同點加以放大，以凸顯異己與我群之間的差別來進一步加深此種異類感。且異族所具有的特殊形象，容易被化約為某種刻板的圖像而在人群之中傳播開來。將他者的形象異類化、甚至符號化，是異己心靈圖像形成的另一種重要途徑。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傳統的文字史料；另一類則是考古圖像資料。文獻資料以成書於先秦及兩漢時期的史料為主，包括經典、諸子、成書於兩漢時期的各種史料以及出土文獻。在文字史料的使用上，重視的是史料形成時的語境，除了能釐清該時期胡人確實的指涉對象外，也較能直接反映當時人們對夷狄、胡人意象的觀感。另一類是利用考古所出土的各種圖像材料，包括刻劃在先秦玉器、青銅器上的人物圖象，各類材質的人形俑像，以及漢代畫像磚石上的人物圖像材料。透過圖像的描繪，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該時期人們心目中（或想像中）的戎狄及胡人之具體形象。由於圖像具有明顯的符號功能，觀察這些當時人所形塑的異己圖像，可讓我們進一步去認識當時人們所認定的胡人，應該具有那些他們所強調的「異類」特徵，這對我們探索胡、漢之別會有相當的助益。當然使用沒有文字的圖像資料不可避免的會有「詮釋」的問題出現，這些問題將在下節會有所討論。

#### 1-1-4 學界既有的成果

胡人的研究在西方學界是門顯學，先前 Jaroslav Průšek 已對商代至東周時期的北狄進行過研究<sup>2</sup>，最近 Nicola Di Cosmo 有一新著問世，但著力點與本文不盡相同<sup>3</sup>。日人那波利貞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發表過長文論述此一問題<sup>4</sup>，算是日本學界較具代表性的專論。但早期胡人的歷史在中文歷史學界似上有努力的空間，之前以早期胡人為題的論文似乎不多，就筆者所見，有從周的 胡人考<sup>5</sup>，張亞初的 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sup>6</sup>，以及喬永的 “胡”字詞義考<sup>7</sup>。薛文波

<sup>2</sup>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Statelets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the Period 1400-300 B.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sup>3</sup>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該書內容可參日人韋山 明之書評，刊《日本中國秦漢史學會會報》第4號（2003年），頁177-186。

<sup>4</sup> 那波利貞：〈支那人が塞外人を胡人と總稱する緣由に關する疑〉，收 羽田亨 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年），頁475-542。

<sup>5</sup> 《正風半月刊》創刊號（1935年），頁56-53。

<sup>6</sup> 《文博》1992年1期，頁8-19、46。

<sup>7</sup> 《新疆大學學報》2001年2期，頁113-118。

另有一短文『胡』略考<sup>8</sup>，但主要探討唐代之胡人。

不過先秦至兩漢之胡人與匈奴之關係非常密切，學界對此有豐富成果。匈奴作為第一個統一大漠南北，也是第一個擁有與中原華夏國家抗衡實力的遊牧政權，很早就吸引了史家的注意。在國外史學界，匈奴史的研究要早於中國的歷史學界，之前姚從吾先生曾撰有《近代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sup>9</sup>，詳述歐洲早期的匈奴研究。近來歐美史家研究匈奴之重要成果，首推 Otto J. Maenchen-helfen 的鉅著 *The World of the Huns*<sup>10</sup>。十年前，義大利學者 Nicola Di Cosmo 也完成其博士論文 *Inner Asia in Chinese History : An Analysis of the Hsiung-nu in the Shih Chi*<sup>11</sup>，這兩本專書算是西方進來重要的匈奴史專著。在日本方面，匈奴研究有其悠久的研究傳承。自白鳥庫吉以降，最有名的當數江上波夫與內田吟風。近來江上波夫以將其研究匈奴的重要論文收錄於其學術論文集之中<sup>12</sup>，內田氏的成果則接收入其專著《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sup>13</sup>。近年來新出版的匈奴史專著有澤田勳的《匈奴——古代遊牧國家の興亡》<sup>14</sup>與加藤謙一的《匈奴「帝國」》<sup>15</sup>，算是新近的研究專著。在中國大陸，較重要的匈奴史著作首推馬長壽的《北狄與匈奴》<sup>16</sup>、林幹的《匈奴通史》<sup>17</sup>，以及陳序經的《匈奴史稿》<sup>18</sup>。當然，其他尚有眾多的學術論文無法一一詳述。

在台灣，匈奴史的研究成果相較於大陸並不遜色。台灣研究早期內陸歐亞史的學者中，高去尋先生的貢獻是不能忽視的。他在《徑路神祠》<sup>19</sup>一文認為：雲

<sup>8</sup> 《邊疆通訊》第2卷11期（1944年），頁8-9。

<sup>9</sup> 原刊《國學季刊》第2卷第3號（1930年），收於《東北史論叢》（台北：正中書局，1969年），頁27-127。

<sup>10</sup>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sup>11</sup> Ph.D Dissertation of Indian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 1991.

<sup>12</sup>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3 匈奴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

<sup>13</sup> 京都：同朋舍，1988年。

<sup>14</sup> 東京：東方書店，1996年。

<sup>15</sup> 東京：第一書房，1998年。

<sup>16</sup> 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

<sup>17</sup>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sup>18</sup>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sup>19</sup> 見《包遵彭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歷史博物館，1971年，頁99-102。該文曾先以英文 *The Ching-Lu Shen Shrines of Han Worship in Hsiung Nu Religion* 發表於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5*

陽的徑路神祠並非某人或某家的宗廟，設立的時間不能早過神爵元年，也與金日磾或休屠王的部眾無涉，徑路神作為匈奴人戰神的風俗與司克泰人相同。文崇一的《漢代匈奴人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形態》<sup>20</sup>，該文成篇的時間雖早，但已全面討論了匈奴史中的幾個重要的議題。謝劍以一個人類學者的角度，透過人類學研究的視野，全面的檢討了匈奴的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及生計基礎，他結合歷史文獻與東、西方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寫出了《匈奴社會組織的初步研究》<sup>21</sup>、《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sup>22</sup>、《匈奴的宗教信仰及其流變》<sup>23</sup>以及《匈奴的生計基礎》<sup>24</sup>等四篇文章，是研究匈奴史者不應忽略的重要研究成果。與謝劍類似，同樣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匈奴研究尚有王明珂先生的《匈奴的遊牧經濟：兼論遊牧經濟與遊牧社會政治組織的關係》<sup>25</sup>一文，該文以近年西方人類學界對遊牧社會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文獻上所記載的匈奴政治、社會情況做出了新的解釋。在匈奴種屬問題上，有耿振華的《漢代匈奴種族問題》<sup>26</sup>及李昱東的《早期匈奴帝國核心部落的考證》<sup>27</sup>。耿文在匈奴語言問題上承襲陳慶隆先生的意見，認為匈奴屬阿爾泰語族而較接近突厥種，人種方面耿氏則認為屬蒙古人種；李文則在余太山<sup>28</sup>、斯維至<sup>29</sup>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推論古史上之獫狁與匈奴實即白種之塞種。

在匈奴語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趙尺子的《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sup>30</sup>，文中認為匈奴語和蒙古語相同，而且中原古代夏、殷時期的語言與匈奴語實為同

no.3 (1960)。

<sup>20</sup> 原載於《邊疆文化論集(二)》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年，頁139-186。後收入氏著《中國古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頁183-231。

<sup>21</sup>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1968年)，頁669-719。

<sup>22</sup>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69年)，頁231-271。

<sup>23</sup>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4分(1971年)，頁571-613。

<sup>24</sup> 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71年)，頁163-190。

<sup>25</sup>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頁9-49。

<sup>26</sup> 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2期(1991年)，頁239-253。

<sup>27</sup> 見《中興史學》第七期(2001年)，頁1-25。

<sup>28</sup>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收錄於氏著《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42~271。

<sup>29</sup> 斯維至：〈從周原出土蚌雕人頭像談獫狁文化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1996年1期，頁92-100。

<sup>30</sup> 原載《中國邊政》4、5、7、8期(1964-1965年)，頁6-8、10-13、35-38、14-18。後收入氏著《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台北：中國邊疆語文研究會，1969年)，頁90-140。

一系統。另一為徐松石的《匈奴蒙古民族考》<sup>31</sup>，徐文論點與趙尺子類似，認為古代漢語的語法與匈奴蒙古語的語法有關，原先和通古斯語、突厥蒙古語、日本語，甚至馬來語差別不大，他以「鞮」字為例來闡釋其觀點。徐氏又認為蒙古人為匈奴人之子孫，匈奴族名中的「奴」字，與「鹿」、「陸」等字同義，為「大澤」之義。另外遼耀東的《試釋漢匈之間的甌脫》<sup>32</sup>一文，認為「甌脫」即 E.C Semple 所謂的「邊荒」，為漢匈之間的緩衝地帶。在匈奴西遷的研究方面，有江鴻的專書《匈奴興亡之追蹤》<sup>33</sup>以及張哲誠的《匈奴西遷》<sup>34</sup>。至於專書方面，有三本可供參考，即林旅之的《匈奴史》<sup>35</sup>、左文學的《匈奴史》<sup>36</sup>與劉學鈔的《匈奴史論》<sup>37</sup>。

縱觀台灣的匈奴史研究，主要集中於幾個學界老問題上的探討，如族屬族源、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宗教、西遷過程等。一些匈奴史學界所熱中的議題，幾乎台灣的學者皆已論及，成果可謂斐然。但缺點是較不能開發新視點，新方法，除了王明珂先生的著作外，其餘皆屬傳統的研究模式。因此本文想嘗試新的思考面向，打算從華夏 - 漢民族對胡人之種族意象方面入手，來反思之前所提及的匈奴史重要論題，希望能為台灣的匈奴史研究注入新意，並提供國內外同行批判參考。

### 1-1-5 研究上之侷限

本文在研究上必須面對三方面的困難，一是史料嚴重不足的問題；二是語言學上的專業問題；三是圖像解讀所具有的爭議性。「胡人」一詞的出現應在戰國時期，但先秦文獻中對胡人的描述不多，故探討先秦時期胡人概念的形成，須大量仰賴成書於西漢時期的文獻，如《史記》與《戰國策》，這是史料限制上的問

<sup>31</sup> 見《日本民族的淵源》（香港：東南亞研究所，1966年），頁144-161。

<sup>32</sup> 見《大陸雜誌》第32卷第1期（1966年），頁21-25。

<sup>33</sup>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sup>34</sup> 見《中國邊政》第105期（1989年），頁22-31。

<sup>35</sup> 香港：波文書局，1973年。

<sup>36</sup> 台北：作者自印，1977年。

<sup>37</sup> 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



題。其次是語言學本非筆者之專長，特別是在古文字學、聲韻學與少數民族古語上，由於本身沒有足夠的訓練，因此極可能提出不成熟的意見。加上早期北方民族之族稱問題非常複雜，一個氏族部落被他族或他部征服、併吞或融合之後，往往自動或被迫捨棄自己原來的族名或部名而改用征服者、併吞者或融合者的族名或部名<sup>38</sup>，這都為族名的語源研究帶來相當大的困擾，也是本研究一個極大的挑戰。再者是圖像資料的解讀問題，由於圖像是屬於沒有文字之史料，故學界常存在詮釋上的歧異。在本文中，這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圖像是寫實或寫意（抽象），有無普遍的風格存在等問題。這些問題有時是見仁見智，原本便容許有各種解釋之面向。本文擬就自身的問題意識來觀察這些圖像，期望能為學術界提供另一種思考的方向。此外，尚有一些重要的問題如戎狄與胡人的關係，胡文化與早期歐亞草原文化之關連性等，也都與本論題相關，但是筆者礙於學力，目前暫時無法解決，只能寄待於來日再行處理。

---

<sup>38</sup> 林 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

## 第二節 語言、圖像、體質差異與他者觀

本文所要討論的重心是早期中國對胡人的概念究係為何？什麼樣的人群被稱作是「胡」？他們是基於何種的原因被稱為「胡」？其中有無某種特殊的判定標準？無論是心理的概念或是視覺印象上，一個典型的胡人應具備哪些基本的特徵？胡人在漢帝國內所從事的職業及社會角色，是否影響漢代對胡人的種族觀念及論述？凡此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 1-2-1 語源、語用與語境

對於早期胡人意象的形成，本文打算從三個面向來切入，即語言、圖像與異己觀。在語言學方面，本文將借助符號學的概念，探討有關「胡」這個字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sup>1</sup>。「能指」有時譯為「符號具」，為符號的形象、記號或聲音，可由感官所感知。「所指」有時譯作「符號義」，指的是符號所指涉的心理概念。同一個文化之內，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們，會有大致相同的概念，符號義是我們將現實世界分門別類以便理解的心理概念，然而類別與類別之間的界限卻是人為的<sup>2</sup>。當我們在使用抽象的語言、文字時，相關的「圖像」也不斷在我們的意識中活動著<sup>3</sup>。在本文中，筆者將嘗試去廓清「胡」這個符號具所指涉的符號義(心理概念)，並透過圖像資料去探索當人們談到「胡人」時，其心中所浮現的心理概念與族群外表形象。

本文的研究方式將先爬梳「胡」字在語源上的本意及讀音，文中將仿效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方式，先釐清「胡」字在秦漢之前曾有過哪些用法？其所指的語意有哪些？從先秦至秦漢其用法曾有怎樣的流變。其中我們不僅進行語源學上的追

---

<sup>1</sup>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00-102。

<sup>2</sup> John Fiske 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年)，頁65、67。

<sup>3</sup> 王明珂：《史料的社會意義：事實、敘述與展演》，《近代中國》第143期(2001年，台北)，頁10。

溯，更想從文化、意識和語言三者間的關係入手<sup>4</sup>，對「胡」字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進行理解。

接下來探討的是「胡」字在漢代的語境 (context) 為何？何謂語境？其主要包含了三個面向：(一) 上下文語境 (Context)。即口語的前言後語以及書面語的上下文。(二) 情境語境 (Context of situation)。即語言交際時的時間、地點、話題、場合交際參與者的身份、職業、思想教養、心態。(三) 民族文化傳統語境。即中外差異 (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價值觀之差異) 與古今差異 (同一民族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sup>5</sup>。本文所側重的一是屬於語境定義中的「情境語境」與「文化語境」。「情境語境」(situational context) 包括了一個篇章或話段的全部非語言背景，包括直接使用於其中的情景，也包括說話人和聽話人對已經說了些什麼的知識，和任何相關的外部信念或預設<sup>6</sup>。在本文將探討在漢代的書寫語境中，「胡」字的情境語境為何？當人們提到「胡」或書寫「胡」之時，其共同的認知意念是什麼，即當人們提到「胡」時，其本能反應下最先浮現的概念為何。其次，本文也欲探討漢代胡人論述的「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即在社會文化中，其對胡人的種族觀念為何。

語境研究在歷史學界尚屬一個待開拓的領域，但近來已有學者開始著力於此，然以治近代史者居多<sup>7</sup>。在歷史研究中，「任何的解釋都牽涉到人先存的歷史文化，先存的語言觀念，先存的前提和假設。離開特定的語境，究無法理解其真實的含義」，因此「只有把相關的言論綜合起來，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考察，才能弄清楚其真實的含義」<sup>8</sup>。在漢代的書寫語境中，胡字所最常用的指涉是什

<sup>4</sup> 曹樹基：《語言歷史的跨文化闡釋》，《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4期，頁153。

<sup>5</sup> 索振羽 編著：《語用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38。

<sup>6</sup> David Crystal 編：《現代語言學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83。

<sup>7</sup> 如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歷史研究》1999年1期，頁104-120；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3期，頁5-23；歐陽軍喜：《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歷史研究》1999年3期，頁42-56；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王學典：《語境、政治與歷史：義和團運動評價五十年》，《史學月刊》2001年3期，頁13-23。

<sup>8</sup> 歐陽軍喜：《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歷史研究》1999年3期，頁48。

麼？而從戰國至秦漢之際，「胡」字的語義曾有過怎樣的轉折，了解漢代對胡字使用的語境，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胡」概念的形成與歷史變遷。

### 1-2-2 考古圖像與異族意象

本文探索胡人意象的第二個途徑是透過圖像的資料。圖像資料能不能當作歷史研究的史料，曾引起學界的討論。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文物或圖像與集體記憶間的關係。個人常將知識與經驗圖像化，以便於回憶；社會也常以文物或圖像構築來強化集體記憶<sup>9</sup>。有人認為圖像資料如果善加利用，頗有助於歷史的重建，其功不在文字之下，即是說可以把圖像資料當作是一種史料，與文獻相結合便能重構歷史<sup>10</sup>。但也有人認為：圖像的寫實程度並不必然會使其具備史料價值，而且容易造成「類型化」的誤解，圖像繪製主體的世界觀、異族觀與分類觀，可能比被描繪的客體更具有討論的空間，甚至真實性<sup>11</sup>。

但基本上在十八世紀中後期以後，史家已承認圖像是歷史文獻，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比文字資料更直接可靠地反應歷史原貌<sup>12</sup>，並突破文字的限制性，給予讀者更強烈的震撼，從而顯示文字史料所不易展現的歷史面向。視覺史料的價值並不只是作為文字史料的附庸，其本身更能傳達許多文字所無法傳達的訊息。其價值不僅在於提供豐富的史料，更在能夠牽引出許多方法論上新的思惟。從其複雜的生產脈絡為起點，這些圖像的產生、傳播與使用，以不同的方式觸及了族群、權力、性別、階級等界限劃分的問題，以及不同界域之相互關係<sup>13</sup>。即使是像蘭克這樣的實證史家，也承認人類所創造的圖像，構成了世界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說：

<sup>9</sup> 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收氏著：《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頁81。

<sup>10</sup> 杜正勝：《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8年5月16-17日），頁2、15。

<sup>11</sup> 詹素娟：《文化符碼與歷史圖像》，《古今論衡》第2期（1999年），頁2-17。

<sup>12</sup> 曹意強：《藝術與歷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頁61。

<sup>13</sup> 張哲嘉：「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迄今」會議報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2期（2000年），頁16、25。

人類為自身贏得了一個傳家寶……這份遺產中最珍貴的寶石乃是文學、藝術、詩歌和科學上的不朽天才之作。……藝術和古物幾乎是平行的觀念，這類往昔的遺物與迄今倖存的古代宗教、儀式和制度……遺風有著天然的關聯。<sup>14</sup>

當代法國年鑑派史家勒高夫 (J.Le Goff) 也曾說：

新史學擴大了歷史資料的範圍，它使史學不再限於朗格洛瓦 (C.V.Langlois) 和塞諾波斯 (Ch.Seignobos) 所主要依據的書面文獻中，而代之以一種多元史料的基礎，這些史料包括各種書寫材料、圖像材料、考古發掘成果、口頭資料等。

<sup>15</sup>

近來中國中古史的研究也因若干考古材料的發現而掀起了另一波以「圖像證史」的討論<sup>16</sup>，足見運用美術材料來作為歷史研究中的史料補充，已不再局限於藝術史學界，史學界也正慢慢接受，並正視此種非文字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然而圖像並不能一味的濫用，否則極易陷入所謂的「相貌學誤置」，即以某種典型的藝術風格來解釋往昔，圖像不應成為歷史分析的唯一基礎<sup>17</sup>。

古代史不同於近代史，近代史擁有相當豐富的圖像史料，甚至是直接的相

<sup>14</sup> 原載氏著之 *Universal history* 轉引自曹意強：《藝術與歷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頁 66、67。

<sup>15</sup> 雅克·勒高夫 (J.Le Goff)：新史學，收姚蒙、李幽蘭編譯：《法國當代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頁 5。

<sup>16</sup> 最近日本 MIHO (美穗) 博物館所藏的北朝畫像石與山西太原虞弘墓及西安北周安伽墓的發現，帶動了新一波的以圖證史熱潮。參見 Annette L.Juliano and Judith A.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 Central Asia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lism* 28 no.9 (1997); 姜伯勤：圖像證史：入華粟特人祆教藝術與中華禮制藝術的互動，《藝術史研究》第二輯（2001年），頁 241-259；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1期，頁 4-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1年1期，頁 27-52。韓偉：北周安伽墓圍屏石榻之相關問題淺見，《文物》2001年1期，頁 90-101。張慶捷：《虞弘墓志》中的幾個問題，《文物》2001年1期，頁 102-108。張慶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浮雕的初步考察，收巫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 3-28。姜伯勤：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石槨畫像石圖像程序試探，同上書，頁 29-50。榮新江：粟特祆教美術東傳過程中的轉化——從粟特到中國，同上書，頁 51-72。鄭岩：青州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虞弘墓等考古新發現的啟示，同上書，頁 73-109。

<sup>17</sup> 曹意強：《藝術與歷史》（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頁 64。

片、影片等圖像資料。但拜現代考古學發達之賜，近幾十年來在大陸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大量豐富的漢代畫像磚石相繼出土，為我們探索漢代人民的日常生活留下了相當寶貴的線索，這就為我們探究漢人心中的胡人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圖像學依據。圖像資料能否成為史料？或容有討論的空間，但圖像材料在新近史學的研究中已有被納入史料，甚至是當成第一層史料來運用的趨勢<sup>18</sup>。如果畫像石上所呈現的圖像資料，能與文獻上的語意相契合的話，這無形中就提高了漢人畫像磚石的圖像資料，能確實相當程度反映漢人對胡人典型意象的可能性。更難得的是在某些繪有胡人形象的畫像磚石上，留下了「胡王」、「胡奴」等榜題，這能在某種程度上大為降低藝術圖像研究中常被質疑的「臆測性」。即使圖像資料無法完全與歷史文獻發生直接的聯繫，我們依然能嘗試著去探討此種象徵形式的製造、傳播與接受過程的歷史<sup>19</sup>。因此本文覺得漢代畫像磚石上所遺留的珍貴胡人圖像資料，是探討整個漢代胡人意象時所必要的論證史料。

總之，在研究漢代考古圖像與歷史真實性之間的關係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考古圖像能否與歷史文獻相對應的問題。然而即使能夠對應，也不代表此種考古圖像與文獻的契合必然已經反映了當時歷史的真實性。其實視覺史料的解釋面向，主要在於「映現」與「再現」兩種觀點的不同。映現的觀點認為圖像忠實地捕捉歷史的一瞬間，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展現文字史料所無法呈現的過去；再現的觀點則認為圖像的產生與消費並非是中立的，涉及觀看的角度與選擇，圖像與其說是像鏡子那樣反映現實，毋寧視之為一種文化產品，應解讀其文化符碼與象徵意涵<sup>20</sup>。本文的圖像分析除了側重在「映現」面向的解讀之外，也關照到「再現」的面向。我們的重點放在探討漢代知識分子與庶民大眾對於「胡人」這個異己（他者）的認知方式與分類內涵，其實這種契合所反映的「歷史真實」與可以作為直接史料的主要價值，應該在於其能夠反映漢代知識分子及庶民的「胡人觀」，甚至幫助我們了解漢代對胡人「種族論述」的內涵與特徵<sup>21</sup>，這才是利用圖像資料研究歷史意義所在。

<sup>18</sup> 雅克·勒高夫 (J. Le Goff)：新史學，收姚蒙、李幽蘭 編譯：《法國當代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頁5。

<sup>19</sup> Peter Burke 著，許綏南 譯：《製作路易十四》(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3。

<sup>20</sup> 黃克武：導論：映現抑或再現？ 視覺史料與歷史書寫，收氏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達與文化構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年)，頁iii-v。

<sup>21</sup> 參張隆志：台灣平埔族的歷史重建與文化理解，《古今論衡》第2期(1999年)，頁24-25。

## 1-2-3 體質差異與異類感

在研究漢人對於他者（異己）的意象時，種族外貌是一項不可忽略的重點。即使是在今日，我們對於他者的第一印象仍來自於彼此接觸之初所獲得的種族形貌衝擊，如果對方有著異於我群的外在體質特徵，或是對方雖然在體質上與我群相差無幾，但穿著不同的衣服或留著不同的髮式，或在嘗試與對方交談時發現對方口操一種我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時，我們便會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他者。譬如說今天我們很容易在街頭認出這個人可能是「外勞」，那個人是個「老外」，原因無他，蓋此二者幾乎不用與之交談便能一眼看出。台灣的外勞幾乎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南島民族所特有的一些體質特徵，是我們能立即辨識的依據，如：較黑的膚色、大而圓的眼睛（即台灣人早期蔑稱的「番仔目」）、平均比台灣人稍低的身高、甚至微捲的頭髮。而台灣所習稱的「老外」，基本上是指那些來自歐美地區國家的白種外國人，高挺的鼻樑，白皙的膚色，深陷的眼眶，卷曲的頭髮，較高的身長，使我們能毫不費力的指認出身旁的老外。雖然近年來「老外」一詞已經擴及到所有來到台灣的外國人，除了白人之外，無論是黑人或同為黃種的日本人、韓國人，現在也都可以被稱為是「老外」。但是即使如此，當某人對你說他認識一個「老外」時，我們還是會直覺的認為他所認識的對象，是一位白種人朋友。

因此，對於他者的認知，一開始就是根植於外在形象與語言上。在先秦時期，髮式似乎是一項重要的判別標準<sup>22</sup>。最淺顯的例子，就是孔子曾經在贊許管仲的「尊王攘夷」之功時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sup>23</sup>。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則記載在《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sup>24</sup>即使晚至清初，滿州人強令漢人男子剃髮，仍引起相當大的反彈，甚至剃不剃髮的問題，還一度成為台灣鄭經政權與清廷談判時的一項

<sup>22</sup> 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51。

<sup>23</sup> 《論語·憲問篇》（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27。以下凡引用十三經，皆使用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清阮元刻本），僅註明頁碼，不再另記出版項。

<sup>24</sup> 《左傳·僖公22年》，頁247。

爭議點<sup>25</sup>。足見在中國，漢人的傳統髮式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尊貴的象徵<sup>26</sup>，髮式的確是區分非我與我、文明與野蠻的一個重要指標<sup>27</sup>。而同時毛髮是一種符號，也是一種場域，裡頭寄託著區隔和認同<sup>28</sup>。過去在各種中國之「蠻苗圖冊」、「百蠻圖」中，漢人繪者常以面目猙獰、身體粗壯的男性「蠻子」為「異類」之代表形象。因為其為「異類」，所以野獸般的形象為其象徵符號<sup>29</sup>。所以本文認為：對於異民族的身體意象，也是他者觀形成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面向。

#### 1-2-4 對胡人的他者觀

本文最後一個分析胡人意象的工具，是考察華夏漢民族對胡人的他者(異己)觀。在文化研究中，「他者」(other&otherness)總是與「自我」或主體描述有關，「他者」與之形成對照，並因此而被定義。在意識型態理論及大部分文化研究裡，他者被解釋為同時脫離又定義了主流社會秩序規範的非自我。他者在文學和文化文本裡常被刻板化而成為幽默的笑柄，或被妖魔化與異國風味化<sup>30</sup>。特別是由古典到現代的過程，因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對「他者」的想像，往往透過藝術的再現來加深刻板化印象，因而形成階級、種族和性別範疇下的「他者」。許多在階級、性別上的弱勢族群，經常會被「他者化」，在「東方主義」中，就是藉由對異族的「他者化」、刻板印象化、邊緣化，來將其物品化<sup>31</sup>。

談到胡人論述的問題勢必不能不提先秦時期對於戎、狄等異族的概念。討論的焦點將先放在先秦時期對於北疆<sup>32</sup>戎狄的分類概念與異己觀，然後再將之與漢

<sup>25</sup> 相關問題可參見陳捷先：《不剃頭與兩國論》(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年)。

<sup>26</sup> 林富士：《頭髮的象徵意義》，收錄於氏著：《小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頁167。

<sup>27</sup> Frank Dikotter, "Hairy barbarians, primates, and wild men: medical scien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hair in China", in Alf Hildebeitel and Barbara D. Miller ed. *Hair: its power and meaning in asian cultur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pp. 51-74.

<sup>28</sup> 參見南方朔：《毛髮文化社會學》，《中央日報》90年7月3日18版中央副刊。

<sup>29</sup>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頁386。

<sup>30</sup> Peter Brooker 著，王志弘、李根芳 譯：《文化理論詞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278-280。

<sup>31</sup> 廖炳惠 編著：《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187-189。

<sup>32</sup> 其實先秦時期的戎狄並非全部分布於北疆，反而有極多的戎狄是活動於華夏民族的核心地域



代的胡人觀作一比較，即比較此二種對北疆他者（異己）的分類概念有無承繼關係，或是兩者間已開始出現轉變？是否因為此種轉變，以致於到了漢代，漢人對於區別胡、漢的標準已經與先秦時期區分戎狄、華夏的標準有所不同。接下來進一步分析漢人如何表述胡人。為我們留下漢代胡人觀念的記敘者，目前所能考察者有三種人：一是留下文獻記錄的知識分子；二是留下漢簡文書的漢代基層官吏與戍守北疆之士兵；三是為後世留下胡人圖像的工匠。雖然有關這類胡人論述的資料並不多見，但本文仍希望透過上述三者對胡人的表述資料，能粗略描繪出漢代對胡人刻板印象的形成過程。最後並探究胡人在漢帝國內的境遇，是否與漢人對胡人的種族觀念與論述有關。

本文也企圖表現出華夏漢民族對於胡人的心理構圖。“心理構圖”（schema）是指個人過去經驗與印象集結所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傾向。每個社會群體的個人，都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這種心理傾向影響個人對外界情景的觀察，以及他如何由過去記憶來印證或詮釋從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這些個人的經驗與印象，又強化或修正個人的心理構圖<sup>33</sup>。充滿對胡人種族偏見的論述，刻板化胡人形象的一再複製，都對一般社會群眾胡人意象的形成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總之，透過上述的這三種分析途徑，本文期望能探究出漢代民眾對「胡人」這個他者的認知、描繪、記述、分類與理解的概念，並歸納、建構出漢人對於胡人的思考方式、描述模式，及將胡人觀念定型化的歷史過程。

---

中原一帶，參見平勢隆郎：《中國古代正統的系譜》，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中國歷史の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都立大學出版會，2002年），頁156。對此本文將於第五章中討論。

<sup>33</sup>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5期（北京），頁137。

